

台湾在中国近代经贸关系中的地位

李 非

中国近代,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关系无论在贸易型态,还是在贸易范围,或是贸易商品,都有较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通商热潮。

一 传统贸易型态的改变

19世纪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陆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汕头和台湾的安平、淡水、鸡笼、打狗等处相继开港,英、美、德、日、荷等外商势力蜂涌而至,沿海地区开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外国商人在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倾销工业品的同时,又廉价输出台湾的茶叶、樟脑、砂糖和大陆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掠夺台湾和大陆的经济资源,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大陆和台湾传统的商品交换形式。这一方面表现在洋米抢夺台米在大陆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洋货夺去了大陆货物在台湾的市场。外国商人从东南亚等地搜刮大量廉价洋米,销售于大陆缺粮地区,使这些地区“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使“台米无去处”。同时,随着洋布等洋货大量倾销台湾市场,大陆货、尤其是棉布受到严重排挤,只能“销行于乡村也”(连横:《台湾通志》卷23,风俗志·衣服)。

根据“台湾淡水、台南海关报告书”记录,在1882—1891年间,海峡两岸直接与转口贸易总值为4003万海关两,平均每年约400万两,其占台湾外贸总值的比重达69.6%。可见,大陆仍是台湾贸易最主要的市场。两岸贸易货值有86.9%经由淡水海关出入,13.1%经由台南海关(包括安平、打狗)出入。这显示台湾对大陆贸易的重心已向北转移。在两岸贸易总值中,有7成属转口贸易,只有3成是直接贸易。在大陆货较台方面,由于洋货的替代作用,大陆对台出品渐趋衰退,同期货值累计为804万两,平均每年80余万两,其占台湾进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4.6%,其中77%是由淡水海关入口,23%是由台南海关入口,另一方面,以大陆为最终转出地的台货出口也在减少之中,但是,以大陆为中转地的台货出口却在增长之中,成为台货输往大陆的主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外国洋行商社多在大陆沿海通商口岸设立总店或据点,其从台湾较出的商品多经厦门等口岸转运,因而形成台货销往大陆的“虚假繁荣”。同期其货值累计达3199万两,平均每年320万两,其占台湾出口总值的比重高达95.5%。台湾输往大陆的货物经淡水海关出口的占89.3%,经台南海关出口的占10.7%。

由于这种直接进出口的货物大量减少,而台货经由大陆口岸转口输出则大量增加,贸易型态实际上已由传统的民间直接贸易转变为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多向性贸易。从贸易差额看,在表面上台湾方面呈巨额顺差,十年累计达2394万两,平均每年239万两,是台湾出口顺差总额的2.2倍。若剔除转口贸易部分,两岸直接贸易大致均衡,台湾方面的顺差仍为100多万两,

平均每年10余万两。可见,顺差收益大多由外商所独占。

附表 近代大陆台湾贸易货值统计(1882—1891)

口岸		大陆货输台 (A)		台货输往大陆 (B)		两岸贸易总额 (A+B)		台湾差额 (B+A)	
		货值 (海关两)	占台湾进口 总值(%)	货值 (海关两)	占台湾出口 总值(%)	货值 (海关两)	占进出口 总值(%)	货值 (海关两)	占台湾顺 差总值(%)
由台南海关进出 ^①	厦门	1775090		3103288		4878378		1328198	
	福州	11126		66774		77900		55648	
	宁波	785			785		-785	
	上海	24322		17310		41632		-7012	
	汕头	2029		238118		240147		236089	
	合计	1813352	50.6	3425490	69.7	5238842	61.6	1612138	120.8
由淡水海关进出 ^②		6228968	31.7	28559858	97.3	34788826	71.0	22330890	230.7
总计		8042320	34.6	31985348	95.5	40027668	69.6	23943028	217.4

注:①台南海关管辖台湾南部港口,主要有安平、打狗等港。

②淡水海关管辖台湾北部港口,主要有淡水、鸡笼等港。

资料来源:H. B. 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

P. H. S. Montgomery《1882—1891年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

二 近代大陆台湾间贸易范围与商品构成

近代大陆台湾间贸易范围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各省,并集中于已开港通商的口岸,台湾对大陆贸易口岸以淡水港为主,安平、打狗、鸡笼等港为辅;大陆与台湾贸易口岸以厦门港为主,汕头、福州、上海、宁波等港为辅。据台南海关报告,在1882—1891年10年间,其对大陆各口岸的贸易总值达542万两,其中出口343万两,进口181万两。在大陆各口岸中,厦门港的贸易地位最为重要,分别高占总额的93.1%,出口的90.6%,进口的97.9%;汕头口岸次之,分别占总额的4.3%、出口的7.0%,进口的0.1%;福州口岸居三,分别占总额的1.5%,出口的1.9%,进口的0.6%;上海口岸居四,分别占总额的0.8%,出口的0.5%,进口的1.3%;其他口岸如宁波、广州等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岸贸易主要是闽台之间的贸易。

近代两岸贸易的商品构成主要是大陆民生消费品与台湾土特产之间的交流。从大陆输往台湾的商品看,以细薄织物类为最大宗,主要是绸缎、南京布(属棉织品)、夏布等,但是,由于洋布的冲击与排挤,经淡水口岸输入的此类货值从1887年的14.7%万两降至1891年的8.6万两,其占该港输入同类织物的比重也由42%跌至27%;其次是粮食类,因台米由自给有余转为自给不足,原可大量出口大米的台湾反而需要输入大米,10年间累计输入28.9万担,另输入豆类9.2万担;其他入口的大陆商品大都是一些杂货,如包装大米的麻袋、装糖的草袋、药品、芝麻膏、成正的丝、盐、豆饼、烟草和木材,但居于次要地位。

从台湾输往大陆的商品看,以茶叶为最大宗,在1882—1891年间经淡水海关出口的货值累计为2680万两,占台湾出口总值的84%,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厦门中转销往美国(占90%)、英国(占7%)以及其他地区(占3%),其原因主要在于茶叶商多在厦门设有总店,生意大都在厦门做好交货;其次是台糖,同期经台南海关输往大陆的糖数量达246.5万担,其中红糖占

94%，白糖占6%，多为厦门的外国公司代理商以挂帐或委托方式购买，也有经香港转运至大陆各地；其他杂货则为中国商人所经营，大都由帆船运输，如薑黄同期经台南海关输往大陆的数量累计达19.3万担，价值近60万两；用于制造夏布的大麻输出数量为1.3万担，价值约10多万两。

上述可见，在近代两岸贸易关系中，直接贸易不断萎缩，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转口贸易则因外商势力的介入不断增加，取代直接贸易成为主流。这一局面主要是由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性质决定的。

三 新的经贸联系形式的出现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视。1875年沈葆楨抚台开禁，放宽大陆人民自由来往台湾的限制，并派人到大陆招募垦民到台湾应垦，先后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设立招垦局，规定凡应募者在生活费、农具及租税方面给予支助或优惠。据载，当时应募者甚多，如广东汕头一局曾“招募潮民二千余名，用官轮船载赴台湾”从事开垦。从解禁到招垦，大陆和台湾经贸关系从民间形式的交往发展到官府有组织地对台湾进行全面大规模的开发，从而直接推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1885年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设“抚垦总局”，继续招募大陆沿海地区人民迁台助垦，并在新辟之地设治管理。随着台湾开发日兴，土地日辟，大陆移民大增，人口从建省前1883年的250万人增至1895年的370万人，行政区域也从府治改为省治，设三府一州三厅十一县，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近代大陆台湾经贸关系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光绪初年清政府开始筹划铺设厦门至台湾海底电线，开创两岸通信联系之先河。1887年沪尾（今淡水）至福州海底电线也贯通，进一步加强了大陆和台湾通信联系。刘铭传治台时，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以“飞捷”、“南通”邮船传递台湾与大陆之间信件；并设立招商局（后改称通商局），先后定购轮船8艘，航驶于台湾与上海、香港、福州、厦门等港口之间，两岸航运联系也由帆船时代步入汽轮时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大陆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清治台湾期间，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由清统一台湾以前以大陆通过台湾的转口贸易为主流，逐步转向清代中叶频繁的民间直接贸易，至近代又再次转向以台湾通过大陆的转口贸易为主流。但是，几经沧桑变化，台湾与大陆二者的贸易地位发生位移，贸易形式也出现变化。这二次转折主要是由于局势发生巨变所致。第一个转折点是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成为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转折点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两岸沿海口岸相继开港，外商势力侵入，双边市场逐步为列强所占领，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市场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